

《中华日报》两阶段之始末

陈 谦

青岛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中华日报》创办之时,正逢“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内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重要时间节点。汪精卫为了独树一帜,扩大政治影响,需要有一个发声渠道。《中华日报》的系统化及普遍联系的新闻编辑思路,在当时较之它报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左联”作家、左翼经济学人与《中华日报》合作办副刊,是利用《中华日报》“改组派”色彩中的某些相容性,为自己策略性地找到了可以暂时容身之处。汪精卫另立政权(或曰投敌),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极端化,而《中华日报》则与之如影随形,是派系政治极端化的记录者。《中华日报》是日伪合谋贩售所谓“和平建国”“中日亲善”“东亚共荣”政治骗局的大招幌,更是掩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遮羞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关键词:《中华日报》; 改组派;《中国经济情报》; 汉奸报纸; 林柏生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 (2021)02-0015-15

《中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在上海出版的报纸,创刊于1932年4月11日。它在中国新闻史论著中,大多只是作为所处时代的“背景”与“陪衬”,少有人对之进行专门的研究。然而,《中华日报》毕竟在汪精卫及伪政权历史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它在何种背景下创办?它与“改组派”有何关联?它为何曾与共产党及左翼人士合作办报?以及它如何走向“汉奸”不归路?如此种种,都是引起人们关注的话题。这些在笔者的论述中多少能够得到一些答案。

《中华日报》的办报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2年4月至1938年10月为第一阶段;1939年7月至1945年8月为第二阶段。《中华日报》的创办是经汪精卫授意由亲信林柏生执行的,尤其是第一阶段可视作汪精卫的私人报纸,退一步也可将其看作具有“改组派”色彩的报纸;在第二阶段,《中华日报》名义上作为汪伪政权的中央机关报,但实质上更像汪精卫的个人御用报纸。

笔者以为,欲论《中华日报》,必须由“改组派”说起。

一、“改组派”与《中华日报》的创办

“改组派”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馥等为首的政治派别,其全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图书出版史(1921—2017)”(18BXW0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谦,男,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史、政治传播及传播理论研究。

同志会”,1928年年底在上海成立,其思想主张既与国民党右派有所对立,又在关键问题上与共产党的主张有区别,迷惑了不少在“大革命”失败后苦闷的左派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一度风靡全国。

“改组派”的出现是1927年前后国民党内部各种矛盾和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矛盾和斗争可以追溯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期间。国民党内部的阶级、阶层来源复杂,因而其成员认识不一,存在着诸多矛盾,逐渐形成不同的政治路线与派别。孙中山逝世后,矛盾与冲突则愈演愈烈。汪精卫先是利用“廖仲恺遇刺案”打压了胡汉民一派,而后起的蒋介石则将汪精卫视为竞争对手,在“中山舰事件”中,汪精卫的势力遭受打击,导致汪、蒋二人的矛盾公开化。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然而另有所图的蒋介石挑起“迁都之争”,后又率师从江西进军上海、南京等江浙地区,建立南京中央政府,出现了所谓“宁汉分裂”的局面。不久,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又实行“分共”,形成了短暂的所谓“宁汉合作”局面。“四·一二”与“七·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更加激烈,其中以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表面上的“宁汉合流”局面很快就不复存在。当时国民党内的总体情况,按照陈公博的说法是,“清党以后,最苦闷的是一般青年。这一般先生决意不肯做共产党,而又苦于中国没有出路,戴季陶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是不能满足他们的知识荒的,南京中央党部把孙先生抬起来要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他们也是怀疑的”^①。加之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失败。于是,同年5、6月,陈公博、顾孟馥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改革为号召,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随后他们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标榜“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政权。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地方支部一度遍布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等十七八个省市和法国、日本、越南及香港地区等,会员达一万余人。“改组派”形成后,首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攻势,接着又先后策动张发奎和唐生智、石友三等起兵讨蒋,但均告失败。为了策应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联合反蒋战争,1930年8、9月间,汪精卫还在北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后因军事上的失败,所组“政府”瓦解。蒋介石随后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改组派”遭到沉重打击。1931年初,汪精卫宣布解散“改组派”组织,但作为政治派别,仍参加了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因“九·一八”突发事变,迫于一致对外的形势压力,遂暂放弃内斗。随着1932年年初汪、蒋之间再次合作,就连“改组派”的说法似乎也成为历史。

创办报刊并通过报刊的言论来影响政局以谋取政治利益,是民国“北京政府”以来实行所谓“政党政治”的一大景观,至“南京政府”创建以来,虽实行一党专制,但党中有派,派系领袖创办自己的宣传媒介相沿成习。有学者指出,“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②,不同派系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为自己发声——创办报刊、书店(出版机构)等宣传媒介,同时也意图彰显各自的区别界限,“CC系”如此,“政学系”如此,“再造派”如此,而“改组派”更如此。需要指出,“改组派”

①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页。

② 田弘茂:《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转引自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绪论》,第7页。

的正式组织虽已瓦解,但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馥等“改组派”的上层分子仍然不断窥望时机,欲图东山再起。可以说,“改组派”形式上虽已消亡(其他各派也未必都具有形式上的组织),但其基本的政治理念依然有所保留并且持续得以贯彻,又由于他们非常热衷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希望攫取关键性的政治权力,因而透过报刊来宣传政治主张,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就成为不二之选。

《中华日报》的创办,正逢“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之后,国内政治纷争愈演愈烈的重要时间节点。汪精卫本人非常重视培植自己的舆论宣传工具。早在叛国投敌、组织南京伪政府以前,汪精卫为了与蒋介石、胡汉民鼎足而立,就在具有政治超然地位的区域——香港创办了《南华日报》,由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①任社长,从事政治宣传活动。前文已述,“改组派”形式上被消灭,但思想观念上依然形成了一个派别——可称为“汪派”。以“汪派”的野心而论,他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放弃对权力的追逐。“九·一八”事变后,汪与蒋再次合作。这时的办报问题,按照时任《中华日报》编辑郭秀峰后来的说法,就是“汪精卫为了独树一帜,扩大政治影响,认为原来设在香港的《南华日报》已负担不了这个任务,想在上海设立一个宣传机关”^②。于是林柏生秉承汪精卫的旨意,从香港率领《南华日报》一部分班底赵慕儒、许力求、伍培之、颜加保等来到上海,作为开办《中华日报》的基本队伍,又在上海拉拢同乡叶雪松、陈少翔、李屋等作为营业部工作人员。社址最初设在一条小弄堂里,用平版机器每日出版半张小型报。“后来领到铁道部的二十万拨款,才向德国人买到一部卷筒机,把馆址迁到河南路三马路口沿街的二层楼房”^③。

要在上海办一张报纸,需要大笔资金。据郭秀峰回忆,时值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汪派人物也得分几个部长职位,如顾孟馥任铁道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都是‘肥缺’。汪精卫就利用这个机会,筹划基金,准备在上海办报。铁道部的财政由总务司主管,汪精卫派自己的私人秘书曾仲鸣去当司长,并巧立名目,命曾仲鸣拨出大洋二十万元,派林柏生在上海筹建《中华日报》”^④。《中华日报》于1932年4月11日创刊,除林柏生任社长外,总编辑为赵慕儒,徐力求任总主笔。

在《中华日报》创办之初,金雄白^⑤以报人兼律师的身份,为《中华日报》的创刊提供了不少便利。金雄白原与汪精卫的私人秘书曾仲鸣相熟。1932年年初,曾仲鸣将林柏生介绍给金雄白,并告知金,林柏生奉汪精卫之命,要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但由于林柏生对上海报业各方面的情况不够熟络,

① 林柏生(1902—1946),广东信宜人,1924年担任汪精卫秘书,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返国任黄埔军校教官,1929年奉汪精卫之命在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创办《南华日报》并任社长,1932年又奉汪精卫之命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抗战爆发,前往香港主持《南华日报》。1939年到上海复刊《中华日报》,还担任伪中央常委兼中宣部副部长、部长。1946年10月8日被以汉奸罪处决。

②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6页。

③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67页。

④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66页。

⑤ 金雄白(1904—1985),笔名朱子家,上海人,1930年担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并兼任律师。1939年投靠汪伪政府后,历任法制、财经方面多项伪职,并曾任伪《中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翌年移居香港。1973年曾创办《港九日报》,1985年病逝。

希望金雄白给以协助,金雄白满口答应此事。就这样,“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助他”。事实上,金雄白承担着《中华日报》顾问的职责。^①于是,《中华日报》作为“改组派”或曰汪精卫私人报纸,登上历史舞台,此为第一阶段。

二、《中华日报》的编辑方针与版面安排

1933年,借《中华日报》创办行近一周年之际,总编辑赵慕儒撰写了题为《一周来的〈中华日报〉》的纪念文章,文中揭示了关于《中华日报》的诸多信息。

(一)《中华日报》办报背景与宗旨

《一周来的〈中华日报〉》的作者赵慕儒指出,《中华日报》是在中华民族内外交困及“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的关键时刻创办,并“辱承海内外同胞之爱护,销数得以日增”^②。云:“回忆本报出版之初,正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候,国势替凌,民生凋敝,复以东省沦亡之后,淞沪血战之余,举国惶惶,莫能所止,本报同人自觉其责任之重大,奋其精力,竭其绵薄,期作社会的公仆,国民的喉舌。”^③《中华日报》“首以统一全国国民的意志”为宗旨,并认为“革命之所以致败,国势之所以日危者,其原因胥在意志不能统一,以致民气民力涣为散沙,故在党则同志视如仇雠,在军则胞泽血肉相残,在国则政见纷歧,互相敌对。以若是之国家,谓能自拔,古今中外,未之有也”^④,希望国人能够“卧薪尝胆,持以毅力,继以忠勇,欲战尤须万众一心”^⑤,认为上述种种皆《中华日报》创刊“一年以来,本报同人,披肝沥胆,誓与国人共勉者,唯此一义而已”^⑥。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办报的背景与宗旨并非全然堂皇之语,至少交代了当时内忧外患之情势,但郭秀峰所言“汪精卫为了独树一帜,扩大政治影响”,亦非妄言。

(二)《中华日报》出版情况与版面安排

《中华日报》创办之初,“正沪战方殷之日,百端草创,日仅出纸一大张,及后销路日增,同人益用自勉,遂有分期扩充计划”^⑦。扩充计划分为四期实施:“第一期去年六月间,首由一大张增至一张半,七月间以热河告急时局紧张临时刊行夜报半张”;“第二期九月再由一张半增至两大张”^⑧;第三期计划为1932年11月间“迁移新馆以后,社会期望愈殷,乃于本年二月实行第三期扩充计划,每逢星期日,印行星期增刊,分社会妇女电影三版,随报附送,不另取资”^⑨;因“自是以后,销路愈畅”,于是再于1933年3月1日起实行第四期扩充计划,即增设《中华月报》及提出具体的措施。

①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香港:春秋杂志社印行,1959年,第30—31页。

②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③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④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⑤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⑥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⑦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⑧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⑨ 赵慕儒:《一周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对于第四期扩版的具体措施,赵慕儒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

其一,“增发各地专电”。自“国难”以来,京、粤、平、津等几个地区,由于各种原因已成为重要的消息来源地,因其“或逼近于前线,或居政治之中心,或为消息之总汇,即在平时,其所来之消息,已至关重要,况在今日,其重要更可想而知”^①。《中华日报》除原有各地电讯外,重点在上述地区“加派专员”,“按日拍发特电,务求将政治军事外交之重要消息详确敏捷报告于阅者”^②。可见,《中华日报》关注对时局动态快速有效的传递,尤其关注重点地区,也间接地交代了在上海办报的地缘因素。

其二,“注重时局专讯”。“时局专讯,为本报特创之栏目”,“各地专电”栏目注重时效,“贵其简明,往往于政治军事外交之因果果变,未尽其详”,因此,在重点地区派专员撰述时局专讯,对事件、消息做详尽报道,“以补专电之不足”^③。

其三,“刊载专门著述”。《中华日报》第四期改版后开始“特约国内知名之士,学术专家,各就其所见,翻译或著述富有材料而可供参考之文字”,分日刊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国际时事等专论,“务使读者于饱饫新闻之余,更得良好之参考”^④。

其四,“增刊各种副刊”。第四期改版后,《中华日报》更加重视副刊。作者认为,《中华日报》“以报纸之性质,应为多方面的,故一完备之报,不仅在于新闻,新闻以外之附载,实有相当的重要”^⑤。在原有的《小贡献》副刊外,《中华日报》进一步分日增设“社会科学”“文艺月刊”“十日文学”“明日新闻”“法轨”“两世界”及“电影新地”等八大副刊,撰稿者“均为知名之士”。

(三)《中华日报》新闻编辑理念

报纸的责任“不仅在于汇载形形色色之消息”,无论是政治消息还是国内要闻等,最重要的是在时空上贯通“所汇载之消息”之“因果果变之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日报》认识到所有新闻、消息虽可暂分为不同门类,但这些消息可能牵涉到不同的方面,如表面上是经济新闻,但可能事关军事,军事要闻的编辑者也要有所重视。从作者的表述看,这种系统化及普遍联系的新闻编辑思路,在当时较之它报,的确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故作者不无自豪地说:“本报编辑之方法,即深深致力于此,虽不敢云创新纪元已得门径,然窃未肯陷于中国报纸编辑传统之窠臼,本报同人于追随先进从事报业之中,私相免勉者此耳。”^⑥

由上观之,随着不断改版增容,《中华日报》俨然一副大报模样,同时彰显了汪派对舆论发声的重视,从一个看似不显眼的侧面透露出其政治抱负或野心。

三、《中华日报》与“左联”作家、左翼经济学人的合作

关于《中华日报》创刊初期的情况,据郭秀峰回忆:

① 赵慕儒:《一周年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② 赵慕儒:《一周年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③ 赵慕儒:《一周年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④ 赵慕儒:《一周年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⑤ 赵慕儒:《一周年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⑥ 赵慕儒:《一周年来的〈中华日报〉》,《中华月报》,第1卷第2期,1933年。

报纸出版后,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后来扩充到日出一大张,内容有“国内要闻”、“国际新闻”、“社会经济新闻”、“文艺副刊”等,才略具大报规模。这时内部人员也不断增添,除排字房、机车间外,编辑部有总编辑赵慕儒,总主笔许力求,编辑伍培之、杨青田、姜解生、黄折冲,副刊编辑聂绀弩^①、刘石尧^②等,营业部则有叶雪松、颜加保等。当时这张报纸,在上海读者不多,只有副刊引起一般青年读者注意,在学生中略有销路,每日发行份数也不过一万份左右。^③

郭秀峰所言“只有副刊引起一般青年读者注意,在学生中略有销路”,颇值得注意。《中华日报》创刊后陆续创办了好几种副刊,郭秀峰在回忆文章中并没有点出具体名称,但据笔者推断,郭秀峰所指首当文艺副刊。

说到文艺副刊,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由聂绀弩主办的文艺副刊《动向》最有影响。聂绀弩当时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成员,早年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与林柏生相识。聂绀弩于1931年又曾留学日本。1933年底,因在东京编辑反日刊物,被日本警察厅驱逐出境,回到了上海。由于正值初创期,在报业发达的上海,《中华日报》名气不大,销路自然不畅。林柏生于是计划通过办副刊来吸引读者,得知昔日好友聂绀弩在沪,便请聂绀弩协助创办文艺副刊,聂绀弩欣然接受。据聂绀弩回忆,“本来说好副刊于1934年1月1日开始,但实际上《动向》可能是3月1日才创刊”^④。据说,聂绀弩为《中华日报》编辑《动向》副刊的活动是征得“左联”同意的,说明聂绀弩与《中华日报》合作办副刊并非纯粹个人行为,这里面可能有中共党组织的决断因素。

《动向》的特色是多杂文,短小精悍,犀利泼辣。“左联”旗手鲁迅也在《动向》上发表了许多痛切时弊的杂文,其他左翼作家如宋之的、田间、周而复、艾青、张庚、欧阳山等都是《动向》的基本作者。《动向》受到文教界的欢迎,影响日益扩大,《中华日报》的销路也随之激增。

大众语^⑤问题的讨论是1934年《动向》的热点,为《动向》中发表量较大的部分,聂绀弩本人就在《动向》上发表了20余篇谈大众语的文章,而且带动了《申报》《大晚报》等报刊也来讨论这一话题。此外,林柏生还请聂绀弩找人为《中华日报》写社论,聂绀弩曾请胡风写了一篇,后来也找杜国庠写过

① 聂绀弩(1903—1986),湖北京山人,1921年考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2期,1926年受国民党派遣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四·一二”政变后,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职。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后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九·一八”事变后前往日本,1932年经胡风介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1933年2月,因参与日本左翼文化运动,与胡风等被捕入狱,7月一起被驱逐回国,参加上海“左联”活动。1934年4月,创办《中华日报》的《动向》副刊,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② 郭秀峰的文章记为“刘石尧”,但据其它文献记载均为“刘石克”。

③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67页。

④ 尔矛(根据聂绀弩提供的资料整理):《聂绀弩与〈动向〉、〈新垦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室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

⑤ 1934年,上海左翼文化界展开了语文如何接近民众的讨论,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与大众有隔阂,应提倡一种“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及“看得下”的适合大众需要的语文,即大众语。大众语的论战,对当时“废止白话”“恢复文言”及“尊孔读经”的言论形成冲击,对新文学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起到了推进作用。

一篇。甚至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华日报》发表的社论、专论,差不多都是左联的人写的”^①。

聂绀弩回忆道,由于“《动向》几乎成了左联的刊物,《中华日报》不肯把它继续办下去”,不久停刊,前后持续了八个月,出刊 240 多期。^② 笔者以为,可能是担心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对《动向》副刊的影响会殃及整个《中华日报》,汪派经过慎重考虑,于当年 10 月 31 日决定将《动向》停刊。

据实而论,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报业已十分发达,读者分流严重,“各报对副刊革新热情远远超过对新闻的革新”^③,因而争相创办大量副刊,适应不同层次和兴趣的读者以提高发行量,扩大影响力。《中华日报》如不在副刊上下些功夫,恐怕很难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报业立足。

然而,与《动向》几乎同时创办的另一副刊——《中国经济情报》,郭秀峰本人既未提及(郭秀峰曾在《中国经济情报》的后期担任主编),其它文字资料也很少谈到。笔者以为,郭秀峰“副刊引起一般青年读者注意,在学生中略有销路”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中国经济情报》副刊。

1934 年春,《中华日报》与“中国经济情报社”同人合作创办了《中国经济情报》副刊。中国经济情报社的成员有些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而且基本都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经济学人。

“大革命”后的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对尚处弱小中国共产党而言,环境十分艰险,党领导的苏区正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国民党当局则调集大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直到 1934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离苏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从 1931 年到 1935 年,很多城市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据说上海甚至一度“仅有原属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管辖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仍在坚持对敌斗争”^④。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国统区尚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及左翼人士,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畏艰险,采取各种方式不懈地进行斗争,其中以文化思想领域斗争最为显著。

1928 年,中共秘密党员、学者陈翰笙受聘于国民政府,担任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利用公开身份,组织一批知识分子从事农村经济调研,并通过大量的一手资料,力图分析论证中国社会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实行土地革命。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左翼人士(有些是共产党员)也加入其中。不过,这一调研群体的左翼立场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鉴于当时面临的危机,在陈翰笙建议下,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称“农研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从事农村调研。“农研会”的成员们多数没有具体工作,只靠写稿、投稿换取稿费以维持生计。

当时,“农研会”成员姜君辰正任职于《中华日报》,担任国际版编辑。为了有一个固定的发稿阵地,并且为“农研会”成员谋求稳定的经济收入,姜君辰通过私人关系,与《中华日报》社合作,利用《中华日报》的版面,创办了《中国经济情报》副刊,并包编、包写、包校,每周一期,约一万字,由《中华日报》社每月提供 100 多元作为报酬。于是,钱俊瑞、薛暮桥、骆耕漠、石西民等人成立了“中国经济情

① 尔矛(根据聂绀弩提供的资料整理):《聂绀弩与〈动向〉、〈新垦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室编:《新闻研究资料》第 17 辑。

② 参见尔矛(根据聂绀弩提供的资料整理):《聂绀弩与〈动向〉、〈新垦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室编:《新闻研究资料》第 17 辑。

③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798 页。

④ 马振犊:《国民党特务活动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第 98 页。

报社”,一面从事经济资料的收集、编辑工作,一面负责《中国经济情报》和《中国农村》的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据薛暮桥回忆:当时“姜君辰在《中华日报》工作,除主编国际版外,还主编《中国经济情报》副刊,每星期一版,约1万字。我们都成为《中国经济情报》的主要写稿人。要写经济论文,最重要的是收集资料,为此我们办了一个中国经济情报社,订购全国三四十种重要报纸,选择重要资料分类剪贴……他们一边剪贴资料,一边为《中国经济情报》写稿”^①。

由这批左翼经济学人负责,以中国经济情报社名义编辑的《中国经济情报》副刊,从1934年3月直到1935年6月与《中华日报》社终止合作,共出刊61期,发表文章118篇,属于中国经济情报社成员的文章占一半以上。^②与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合作终止后,《中国经济情报》在《中华日报》持续到1937年3月间,改由郭秀峰主持。

终止合作的原因是由于报方受到“《新生》事件”的影响,认为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左翼色彩过重。毕竟在汪、蒋合作的大背景下,汪派的报纸还是有所顾虑的,况且为了避免派系思想色彩过重,汪精卫也曾在这一阶段发表过“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③之类的声明。

这批左翼经济学人通过在国统区办刊写作,一方面争取了言论空间,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培养锻炼了财经理论素养,为日后新中国的财经事业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推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聂绀弩等“左联”作家、薛暮桥等左翼经济学人与汪精卫的《中华日报》合作的行为,看似很偶然,其原因也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但在笔者看来,其中有一定的必然性。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并不稳固,为了巩固权力,持续镇压共产党人及左翼人士,在城市中实行“白色恐怖”,当时主要大城市的共产党人及组织已被“消灭殆尽”;为了排除异己,蒋介石集团也极力打压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国民党“改组派”自明确形成以来,蒋介石集团对他们的压迫就未曾停止。当时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的生存极为困难,各级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很多人遭逮捕入狱,很多人被杀头,还有不少共产党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生存再求发展,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分散在各行各业从事具体工作,还有不少人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自“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妄图灭亡中国,而当局则一味妥协退让,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国统区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左翼人士,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依然在有限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与斗争。

“改组派”曾经煊赫一时,在遭到蒋介石集团镇压后,“改组派”团体解散,或归附于蒋介石集团,或与之合作。汪精卫指示下创办的《中华日报》就是在汪、蒋合作大背景下创办的,但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分子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主张,即便从争权夺利的角度来看,也不可能放弃。

汪派或“改组派”的主张,我们从其言论中可以一窥崖略,从而能够大体看出左翼人士与《中华日报》合作创办副刊的原因。

首先,汪派之所以被称为“改组派”,是因为他们声称要继承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提出的“改

①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51页。

② 吴敏超:《〈中国经济情报〉与左翼经济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修订本),第332页。

组精神”，即“联俄”“容共”^①“扶助农工”。然而事实上，他们的主张与改组精神是背离的，如反对“联俄”，陈公博指出：“第三国际最大的谬误，只想扩大共产党的势力，……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方面更要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第三国际和俄国扶持中国共产党“是别一个支配中国的反动力，但与帝国主义之妨害国民革命则无异致”，^②这种情况威胁到了国民党的总体利益，因此要反对第三国际，反对“联俄”；反对“容共”，汪精卫说，“总理于十三年春间改组本党，容共政策，亦于此时确定，惟容共仅属一时政策，决不能谓容共即为本党改组精神所在”^③，并声言：“本党十三年改组之后，尤注意唤起民众之工作，然共产党人麇杂其间，其所谓民众组织、民众运动，表面上虽若共同努力，实际上全异其趋向。本党欲领导民众趋于自治，故使之共同担负地方自治工作，俾各民众同甘苦、共劳逸，以求得共同利益，共产党则欲煽动民众，趋于扰乱，故以阶级混斗之说肆其挑拨，务使工商企业无所措手，农民失耕，工人失业，多数民众彷徨而无所归，然后得所凭藉，以夺取政权，数年以来，民众组织、民众运动，惹起社会之不安，其原因悉由于此。”^④他们认定第三国际和俄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为了火中取栗，乘势夺权。因此，由反对“容共”进而分共，直至反共。

其次，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等人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以劳农小资产阶级为政治基础。陈公博说，“目前我们要继续树国民党的基础，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⑤，“因中国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迫切的希望，在国家之平等自由，如政府不能去抵抗帝国主义，则其政府的基础必然不能永久，将来的政府，无论其产生方式如何，若希望完成政府的使命，首先在反对帝国主义，以形成其独立的国家”^⑥。然而关于国民党的政治基础，“改组派”成员中间有所分歧。以陈公博为代表的“革命评论派”主张“反对军事独裁，主张恢复民国十三年（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精神，主张国民革命要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代表农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恢复民众运动，采取民主集中制”；以顾孟馀为代表的“前进派”主张反对军事独裁，实行民主，但强调国民党要以“农工小市民”为基础，“不但反对阶级斗争，并且根本否认中国有阶级的存在，连‘小资产阶级’的名称都不赞成提，同时认为民众运动是可怕的”^⑦。

总起来看，“改组派”在思想主张上反对帝国主义，承认阶级的存在，但对阶级斗争问题的态度采取或暧昧、或弥合（甚至不承认阶级斗争），主张以农工小资产阶级及小市民为自己的政治基础。

“改组派”自认为认清了共产党的面目，完全采取反共的主张，甚至更为积极地反共，而且还提出了通过“争取工农民众而不是反对民众运动从而反共”的路线。他们认为：“在反共的工作中，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去反共，不要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反共。有些人因为反对共产党，遂反对民众运动，其实，这样是共产党所最喜欢的。共产党与本党所最冲突的就是民众运动，所争的就是民众运动的领

① 国民党一方一直称“容共”。

②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61页。

③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95页。

④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81页。

⑤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65页。

⑥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40—341页。

⑦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55—56页。

导权。”^①笔者觉得这正是“改组派”较之国民党右派对于共产党及民众运动更为切中要害而且具有蛊惑性的看法。

然而,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眼里,“改组派”的言论主张与共产党区别不大,因而斥之为“共产党的朋友”或“准共产党”。一般知识青年认识不清,也有可能将两者相混淆。

对于“改组派”的蛊惑,共产党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有着深刻的分析与批驳。共产国际执委在给中共中央的信函中曾指示:“改组派”“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争夺民众运动的领导权,扩大自己反共的影响,并指出它是妨碍工农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②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曾连续几期发表文章,批判并澄清陈公博主办的《革命评论》所散布的改良主义幻想,指出反共反对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对于国民党其他派别,我们“把它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④。周恩来的论述,正显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国民党的斗争中,思路是清晰的,是讲求策略的。

综上,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左联”作家、左翼经济学人正是利用《中华日报》“改组派”色彩中的某些相容性,为自己策略性地找到了可以暂时容身之处、积蓄之所。

中国经济情报社同人主办的《中国经济情报》很快获得了进步读者的好评,《中华日报》的销量也有所增长,但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就在这时(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中国经济情报》《中国农村》等不免受到波及。《中华日报》摄于政治上的压力,决定终止了与中国经济情报社的合作,《中国经济情报》副刊改由郭秀峰任主编继续出刊。正是这时,身为中共中央“文委”成员的钱俊瑞,与徐雪寒、姜君辰、薛暮桥、孙晓村、张锡昌、骆耕漠、朱楚辛、石西民、华应申等反复讨论了环境与形势,一致决定集资创建自己的宣传出版阵地——“新知书店”,从而走上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直接创办文化出版机构的道路。

四、伪政权时期的《中华日报》及末路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汪精卫随国民政府西迁而远离。这样一来,《中华日报》既没有了所效命的主人,更失去了经济支持,苦撑到1938年10月后不得不停刊,林柏生也离沪返港,继续主持《南华日报》,叶雪松、郭秀峰等则在沪留守,利用机器设备接印外来小报稿件,维持门面。^⑤《中华日报》停刊后的实际情况非常窘迫,金雄白为此提供了不小的帮助。金雄白记述道:

到了民国二十七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前

①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104页。

②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679页。

③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8页。

④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682页。

⑤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68页。

夕,他到我家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只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中华日报》的经济一向不太好,到了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经积欠了房租七八个月,业主起诉的结果,判令迁移,并将《中华日报》自置的德国高速度“伏美”牌轮转机拍卖抵偿。到那时,雪松才来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职业,我就为他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以机器为蔚蓝书店所有为由,反对以之拍卖抵偿《中华日报》的欠租。异议之诉终于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房屋与机器,也幸而得以保全。^①

1938年年底,汪精卫出走越南河内,并通过林柏生在香港主办的《南华日报》发表了“艳电”,一时舆论大哗,汪精卫为千夫所指。1939年5月,汪精卫等人不顾舆论的谴责,悄然抵达上海,开始所谓“和平运动”和“还都”建立新政权的汉奸勾当。

1939年夏季,林柏生从香港给留守上海的叶雪松发电报,通知叶雪松复刊《中华日报》,以响应汪精卫的“和平”主张。叶雪松这时又找到金雄白,要他协助延聘有经验的编辑人员,并疏通望平街报贩发行复刊后的《中华日报》。^②林柏生等随后从香港来到上海,于同年7月10日恢复了《中华日报》,继续为汪精卫效命。《中华日报》复刊后,日出一张半,林柏生担任社长,徐力求任副社长,叶雪松任总经理,郭秀峰任总编辑,其他主要人员有褚保衡、殷再纬、颜加保等。^③就这样,《中华日报》开始了作为汉奸报纸的历程。此为第二阶段。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所谓“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后,汪伪政权的新闻事业也开始进一步扩充与强化,在其统治区内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新闻宣传网络,报纸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统计,汪伪政权建立之后,华中沦陷区计有报纸68种,华南7种。^④除《中华日报》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南京的《中报》《中央导报》《民国日报》,上海的《平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及广州的《中山日报》等。

汪伪建立的新闻宣传机构,实质上沦为日本侵略者进行殖民宣传的工具。它前期的宣传中心是为所谓“和平运动”进行辩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心任务则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刊载“大东亚圣战”消息,鼓吹“大亚洲主义”“共存共荣”等言论。

《中华日报》名义上是汪伪政权的机关报,实质上更明确地说是汪精卫的御用宣传工具,为汪精卫的主张摇旗呐喊,不遗余力,发表了大批宣扬所谓“和平运动”的文章,汪精卫公开投敌后的第一篇文章《中日基本关系之观念》就发表在《中华日报》上,以后陆续发表了如《和议之实现与国民政府之重建》《战难,和亦不易》《正告重庆政府》等文章。伪政权在南京建立后,《中华日报》大部分版面都用于详细报道汪伪政府的消息和汪精卫等人的主要言行,且位置十分显著。该报最初日出两大张,各种纪念日增出特刊,发行量最高时约为五六万份。^⑤

①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31页。

②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31页。

③ 1940年3月,郭秀峰等调离《中华日报》后,徐力求兼任总编辑。1941年编辑班子作了大调整,林柏生调任伪“中宣部部长”仍兼社长,徐力求任代社长,古泳今任副社长,胡兰成任总主笔,刘石克任总编辑。

④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第893页。

⑤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996年,第881页。

骆正林在《抗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的舆论传播策略》一文中,将汪精卫投敌前后的言论概括为“兜售‘和平运动’”,具体包括:(1)以“国家利益”为幌子;(2)散布悲观、投降论调;(3)鼓吹“和平运动”;(4)污蔑中国共产党;(5)以“孙先生的遗志”为招牌及(6)讨好日本侵略者等几方面。^①总体上看,汪精卫在投身所谓“和平运动”及建立伪政权过程中,其言论行止的绝大部分内容均登载于《中华日报》。骆正林在文中还将汪精卫的言论发表情况,择要列表加以显示,^②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日报》对于汪精卫的重要性。

包括《中华日报》在内的汉奸报纸在沦陷区表面上堂而皇之,正常运转,但实际上很多民众并不买账,或明或暗地予以抵制,同时还不乏国民党特工的暴力袭击。1939年7月《中华日报》复刊之初,租界内的报贩就拒绝販售;12月4日,《中华日报》的排字工人激于义愤,在该报广告栏内排入“打倒卖国贼汪精卫”字样并得以面世,使该报负责人及汪伪集团狼狈不堪;在汪伪特务残害抗日报人、报馆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工则以血还血、以牙还牙,1939年10月2日和10日,《中华日报》馆两次被投手榴弹,8人被炸伤。^③事件发生后,“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派人保护,指定特务头子潘达和潘曙东率领特工人员经常前来巡逻,才能照常出版”^④。

《中华日报》馆内还发生过一起颇为蹊跷的爆炸案。1941年8月9日,《中华日报》馆发生大爆炸,机器设备损失惨重,导致业务无法正常运转。汪伪政权声言是重庆方面所为,扬言报复。但据当时的《苏讯月刊》(可能是重庆方面的地下刊物)中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华日报〉被炸内幕》分析,认为这起爆炸案应是李士群指使手下所为。起因是李士群与周佛海的内斗——周佛海向汪精卫建议裁撤李士群所负责的“警政部”,此举触动了李士群的利益,李士群仗着自己后台硬^⑤,利用自己的御用报纸《国民新闻》攻击“政府”,引起汪精卫和周佛海的不满,遂对其提出了警告。一怒之下的李士群铤而走险,派人混入《中华日报》馆安置炸弹,实施报复。“政府”明知此事可能系李士群所为,但为了息事宁人,掩盖矛盾,谎称由重庆特工实施。^⑥笔者以为,该文揭示了汪伪政权内部存在着明争暗斗,确系事实,而且据金雄白记述,李士群的确曾利用《国民新闻》攻击过周佛海,但并没有提及这起爆炸案。^⑦该文虽确认爆炸活动是李士群所指使,但并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不过,从后来李士群被投毒暴毙^⑧的下场,大体可知他树敌之多、结怨之深,也可以窥见汪伪内讧之烈。如此看来,《中

① 骆正林:《抗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的舆论传播策略》,《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② 骆正林:《抗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的舆论传播策略》,《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③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884—885页。姚福申等编辑的《汪伪新闻界大事记》(《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4期)记载有所不同:“10月10日早晨7时半,上海汉口路河南路口《中华日报》社机器间被投进一枚炸弹,并未伤人。一周前,《中华日报》馆新址曾被掷进一弹,未爆炸。”

④ 郭秀峰:《汪伪时期的〈中华日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69页。

⑤ 李士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已投靠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⑥ 参见《〈中华日报〉被炸内幕》,《苏讯月刊》1941年第28期。姚福申等编辑的《汪伪新闻界大事记》(《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4期)对此案有所记载:“8月9日晚上6时20分,上海北河南路《中华日报》馆被重庆特工人员投弹爆炸起火,大火燃烧约5小时,5名工人受伤。”

⑦ 参见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第141页。

⑧ 该案系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熊剑东与日本人合谋而为。

华日报》被炸内幕》一文的说法似乎有几分道理。

汪伪建立的新闻体系——报刊、广播、通讯社,实际上受到日方的控制,日方尤其是对报刊的控制极为严格。1942年4月,日军报道部在上海成立“沪区报业改进会”,由中日双方报社负责人组成;1944年9月成立“中国新闻协会”。在这些报业组织中,《中华日报》自然都是最重要的成员之一。

在日方的控制下,汪伪的新闻工作者还举办了多次会议和交流活动,其中所谓“东亚新闻记者大会”就举行了三次,《中华日报》无一例外都是主要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第一次“东亚新闻记者大会”于1941年8月4日在广州召开,《中华日报》及《平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新申报》《上海每日新闻》等报均派代表参加。汪精卫还亲自出席大会并致辞;第二次大会于1942年8月5日在伪“满洲国”新京举行,还文绉绉地命名为“东亚操觚者大会”。汪伪派出19人代表团出席。除《中华日报》副总编辑梁式外,参加者还有《平报》社长金雄白、《新中国报》社长袁殊、《国民新闻》副社长黄敬斋等;第三次大会于1943年11月7日在日本东京召开,汪伪派出12人代表团。《中华日报》代社长许力求参加了会议,会上采纳了成立“大东亚新闻协会”的提议,许力求被推为理事。^①

日方在控制汪伪新闻舆论机构的同时,还积极笼络新闻工作者个人,组织新闻记者互访以联络感情。1941年2月,日本铁道省邀请汪伪政府派遣新闻记者团访日。伪“宣传部”为此组织了赴日新闻记者观光考察团,全团共9人,就包括《中华日报》总编辑刘石克。该团3月2日出发,参观了东京、神户等地,同朝日新闻社、东京新闻社、日日新闻社及同盟社等,开展了交流活动。

在这类活动中,值得一提还有1943年9月3日由《中华日报》发起组织的所谓“中日新闻记者恳谈会”,声言“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精诚合作”。出席者有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上海市长”陈公博、日本大使馆情报部长、日本驻沪副领事等人,日伪在上海的新闻单位及其控制的私营报社通讯社,均派员参加。《中华日报》代社长许力求在致辞中提出“促使中日两国人民之谅解,达到进一步亲善合作”,“新闻界负有更大责任”。^②

自全面抗战之始,原从加拿大等国进口的纸张,在市面上已经绝迹,国内又缺少卷筒纸可以替代,日伪统治区所用的白报纸均从日本国内和伪“满洲国”输入,并全部由日军报道部进行配给。由于《中华日报》是汪伪政权的机关报,报道部对它十分重视,因此给以特别待遇。

随着日本陷入战争泥沼日深,日伪统治区的纸张供应越来越紧张。汪伪政府为解决纸张紧缺问题,于1941年2月成立了“中央报业经理处”,专门负责报刊的物资、纸张的采购与分配,对各报纸杂志及出版用纸实行限额供应。伪“宣传部”首先通令各小报分别实行合并。缩减活动很快就波及《中华日报》等大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的物资供应更加紧张,新闻用纸尤甚,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措施。为此,《中华日报》等报还发起组成了所谓“节约运动委员会”,开展节约用纸运动。^③然而由于大势不济,该运动收效有限。到1944年2月,伪“宣传部”制定了《文化用纸配给办法》,规定报刊杂志均以“最低限度数目”提出申请,核准后配给。《中华日报》从这一年的2月1日起缩减一半,每日只出一大张,不久又缩减为半张。其它如《平报》《新中国报》《国民新闻》《申报》《新闻报》等

① 参见马光仁:《日伪在上海的新闻活动概述》,《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参见马光仁:《日伪在上海的新闻活动概述》,《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981页。

的版面均有不同程度缩减。

日本军国主义自发动侵略战争之始,到1945年已是财物耗尽,兵源枯竭,失败已成定局。对局势最为敏感的汪伪新闻界早已意识到覆灭命运的降临,加之汪精卫业已身亡^①,一时人心惶惶,许多报刊纷纷停刊,从业人员四处逃亡。1945年6月3日,《平报》刊出启事,率先停刊,不久《国民新闻》《新中国报》相继停刊。《中华日报》虽日益消沉,但在伪政权全力支持下,尚能苟延残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6日,伪政府在“代主席”陈公博主持下宣布解散,《中华日报》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重庆国民政府光复后,包括《中华日报》在内的汉奸报刊被国民政府派员接收,汪伪新闻界的主要成员也受到应有的惩处。《中华日报》最初由“三青团”接收,改出《青年日报》,后国民党中宣部下令由胡朴安负责,用原《中华日报》的资源复刊战前的《民国日报》。^②伪“中宣部”部长、《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代社长许力求、总编辑郭秀峰及其他附逆报纸负责人如金雄白、陈日平、罗君强、陈彬和等受到了审判,其中林柏生于1946年6月被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0月8日遭枪决。

回顾《中华日报》12年走过的两阶段历程,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它从一份汪派报纸到汪伪政权御用宣传工具的基本走向。当然在派系斗争中,报纸是随着它的主人而变化的。汪精卫最初因为派系斗争、扩展言论空间的需要而办报,后来蜕化为宣传所谓“和平运动”“中日亲善”“东亚共荣”主张、辩护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其间的演变逻辑似乎难以说清,有人为汪精卫感到惋惜,甚至为他辩解。但笔者以为,且不论汪精卫及汪伪集团是否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单就日本军国主义“屠刀已架到脖子上”的严峻时刻而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擅自脱离合法政府单独与敌国媾和的行为,怎么说都逃不过、洗不掉“汉奸”的骂名,而作为汪精卫的御用报纸《中华日报》的所作所为,也完全称得上是汉奸报纸。

前文提到,有学者指出“1928—1937年这十年中的国民党政治是‘派系政治’”,这一时期是蒋介石从权力不稳逐渐走向权力稳固直至顶峰的时期。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蒋介石成为全国的“共主”,他在表面上消弭了内部的派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派系斗争依然是暗潮汹涌。自诩为中山先生最亲近追随者的汪精卫,则是这场派系政治角力的失意者,他并不甘于相对无权的境遇,加之“毫政治操守”“反复无常”^③政治投机者品性,均可能使他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对政治权位起心动念。回顾汪精卫的过去,我们知道,争权夺利、“另起炉灶”的行为并非第一次。然而这一次则非同寻常,它是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日本侵略的特殊时期,这一次则成为千夫指、万人骂的汉奸,这好像就是汪精卫前定的宿命,而对于《中华日报》来说,为主子摇旗呐喊、装点门面是它的本分。笔者以为,汪精卫另立政权(或曰投敌),某种程度上就是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极端化,而《中华日报》则与之如影随形,是派系政治极端化的记录者。事实上,汪伪内部依然延续着派系斗争,同时

① 汪精卫于1943年8月旧病复发,1944年3月赴日治疗,终因病情严重,于1944年11月10日不治身亡。

② 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3册,香港:春秋杂志社印行,1960年,第128页。

③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修订本),第495页。

在各自的言论机关——报纸上也有反映。^①

曲终人散,《中华日报》随伪政权灰飞烟灭。林柏生的死刑判决,多少折映出《中华日报》在这场闹剧兼悲剧中扮演角色之重要。可以说,《中华日报》是日伪合谋贩售所谓“和平建国”“中日亲善”“东亚共荣”政治骗局的大招幌,更是掩盖日本侵华罪行的遮羞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笔。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Whole Story of the Two Stages of *The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Chen Qi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founding of *The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coincided with the important time point of the intensified domestic political disputes after the "September 18" and "January 28" incidents. At the same time, Wang Jingwei also needed a voice channel in order to fly his own colors and expand his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was indeed more advanced in editing thought than other newspapers at that time. The writers of the Left-wing League and the economists of the Left Wing cooperated with *The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to run the supplement, which made use of some compatibility of the "reformists" in *The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to find a temporary place for themselves. To some extent, Wang Jingwei's establishment of another political regime (or defecting to the enemy) is the extreme factional politics of the Kuomintang in a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and *The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is the recorder of the extreme factional politics. The newspaper is a big cover for the Japanese puppet conspiracy to sell the so-called political scams of "peaceful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o-Japanese goodwill" and "East Asia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 is also a fig leaf to cover up the Japanese militarism's crime of invading China, constituting a disgr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Key words: *The Central China Daily News*; reformist group; *China Economic Intelligence*; traitor newspaper; Lin Baisheng

^① 除《中华日报》外,《平报》(负责人金雄白)为周佛海代言,《国民新闻》(负责人黄敬斋)是李士群御用工具,《新中国报》(负责人袁殊)的后台则是日本文化特务组织“兴亚建国会”。